

ZHONGGUO
GUDAI
YUYANXUESHI

中国古代语言学史

第 4 版

何九盈 著

中国古代语言学史

(第4版)

何九盈 著



創于1897

商務印書館

The Commercial Press

2013年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古代语言学史/何九盈著. —4版. —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2013

ISBN 978-7-100-08325-6

I. ①中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汉语史—古代
IV. ①H1-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71809 号

所有权利保留。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ZHONGGUÓ GŪDÀI YŪYÁN XUÉSHĪ

中国古代语言学史

(第4版)

何九盈 著

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)

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

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

ISBN 978-7-100-08325-6

2013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×1168 1/32

2013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0¼ 插页 3

定价: 49.00 元



大学毕业时的何九盈, 1961年于北京

题辞三首

——为拙著两《史》商务版而作

一

欧风美雨动根基
偏爱洋鸡厌家鸡
抱冰不抱元和脚
长忆孤灯庾征西*

二

学术原为生命灯
传灯人似风雨僧
韩陵片石真经在
歪嘴和尚正喧腾

三

双剑磨成三十年
寒光直射密云天
人间谁是解牛手
俟解何家姊妹篇

* 柳宗元《河东先生集》宋人韩醇注引南朝刘宋王僧虔《论书》云：“庾征西翼书，少时与（王）右军齐名，右军后进，庾犹不分（忿）。在荆州，与都下人

书曰：小儿辈贱家鸡（庾翼以“家鸡”喻自己的书法），皆学逸少书，须吾还，叱之。”（第五册四十二卷 132 页，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）韩注所引《论书》与《南史·王僧虔传》所载，文字略有出入，末句作：“须吾下当比之。”

柳宗元《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嵩二童》云：“书成欲寄庾安西，纸背应劳手自题。闻道近来诸子弟，临池寻已厌家鸡。”

刘禹锡《酬柳柳州家鸡之赠》云：“日日临池弄小雏，还思写论付官奴。柳家新样元和脚，且尽姜芽敛手徒。”（《刘禹锡集》第 552 页，又收入《河东先生集》第五册四十二卷 132 页）

韩注柳《殷贤戏批……》诗又引后山用此事作诗云：“不解征西诸子弟，却怜野鹭厌家鸡。”

《题辞》活用此典，以“家鸡”喻中国传统文化。

何九盈

于北京西郊蓝旗营抱冰庐

2011 年 10 月 5 日

1985年河南版自序*

“linguistics”和“philology”，二者来源不同，涵义有别，使用范围也应该有别，这是人所共知的。但是，多年来我们对这两个词的实际使用，区分不是那么严格。“目前在外国语言学界对于这几个同义词的使用，也并不规范，常常在同一篇文章或著作里兼用而不加区别的情形是有的。‘linguistics’的涵义已经扩大，‘philology’的涵义倾向缩小。”“在一般情况下，翻译时把两者都叫‘语言学’，也无可非议，因为我们对于‘语言学’的研究内容的理解并不排斥历史范畴。”（劳宁《关于“语言学”和“语史学”的译名》，《中国语文》1956年12月号）本书就是在“涵义已经扩大”的意义上使用 linguistics 这个词的。

语言学是人类社会一门很古老的学科。我们中国人自觉地对语言进行研究，起码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。我国古代没有语言学(linguistics)这个名称，只有所谓“小学”。“小学”的内容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广义语言学大致上相当。

古人为什么要把语言文字之学称之为“小学”呢？这也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。“小学”原本是指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读书的学校。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：“及太子少长，知妃(pèi)色（《汉书·贾谊

* 本文原为河南版前言，现改为自序，内容也稍有增加。

传》亦有此语。颜师古注：“妃色，妃匹之色。”即女色），则入于小学。小者所学之宫也。”卢辩注：“古者太子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入太学也。”汉崔寔《四民月令》说：“农事未起，命成童以上入太学，学五经；命幼童入小学，学篇章。”“篇章”是指《苍颉篇》之类的识字课本。因《苍颉篇》“断六十字以为一章，凡五十五章”^①，故以“篇章”指代这类字书。

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“小学”这个概念产生了新的意义，已由“学校”引申出“学科”的意思。《艺文志》说：“凡小学十家，三十五篇。”“小学”已成为一“家”之言，其内容全都是蒙童识字课本^②。《尔雅》、《小尔雅》这些书不算在“小学”家之类，其理由就是后来《隋书·经籍志》说的，“《尔雅》诸书，解古今之意”，故附经籍之后。可见，汉代所说的“小学”实际上只限于文字学，它的具体内容包括解释文字的形体结构（六书，六体），“通知古今文字”，以及“正读”字音等^③。这些内容，在六艺中都属于书学。张政烺说：“六艺本有小大之别。古代小学学小艺，书数是也。大学学大艺，礼乐射御是也。书数为生民日用所需，不可或缺，故至汉代礼乐射御虽微，而书数不废。自刘歆撰《七略》始专以书学为小学（《艺文志》小学十家四十五篇，无一非字书），屏算术于不顾。”（《张政烺文史论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04年，第213页）

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，“小学”这个概念又进一步扩大。其内容除字书之外，还包括训诂（如《说文》、《字林》等）^④、音韵等方面的著作，而《尔雅》、《小尔雅》、《方言》、《释名》等仍列入“经义”一类，不入“小学”之林。直到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，才把《尔雅》等书列进“小学”一类。从此，“小学”的基本内容才确立下来。只不过在宋代，又有人把“小学”称之为“文字之学”。如晁公武（高宗绍兴二

年进士)《郡斋读书志》卷一说:

文字之学凡有三:其一体制,谓点画有衡纵曲直之殊;其二训诂,谓称谓有古今雅俗之异;其三音韵,谓呼吸有清浊高下之不同。论体制之书,《说文》之类是也;论训诂之书,《尔雅》、《方言》之类是也;论音韵之书,沈约《四声谱》及西域反切之学是也。三者虽各一家,其实皆小学之类。

(王应麟《小学绀珠》卷之四沿用此说)

晁公武把“小学”称之为“文字之学”,这说明古代的“小学”家并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研究的对象,即使在事实上研究的是语言问题,他们也是从文字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研究的。晁公武所说的三个方面的内容,就是指的字形(体制)、字义(训诂)、字音(音韵),即通常所说的文字学、训诂学、音韵学。

由于古人认为“小学”就是“文字之学”,而且总是把“小学类”放在“经部”之中,因此,后人就产生了两种不正确的看法:

一、19世纪以前,中国还没有语言学;

二、“小学”是“经学”的附庸。古代的语言学不能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。

第一种看法是受西方的影响产生的,第二种看法是古已有之。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,但并不全对。

关于中国古代有无语言学,这里有个标准问题。我们不应拿现代语言学的标准去衡量古代语言学,更不应该拿西方语言学的标准来硬套。我们应该从事实本身出发。我们的古人在东汉末年就已经能用二分法分析汉语的音节,从魏晋以后,就能很好地对汉

语的声、韵、调进行分析,并在此基础上,产生了反映汉语实际语音系统的韵书(如六朝韵书以及《中原音韵》等),宋元时代又产生了声韵调相配合的等韵图,明清时代还产生了历史语音学。有的人已明确认识到:“今音不同唐音”,“唐音不同古音”,“音韵之不同必论其世。约而言之,唐虞夏商周秦汉初为一时,汉武帝后洎汉末为一时,魏晋宋齐梁陈隋为一时”^⑤。汉语音韵学的发展,从总的趋势来说,是和汉语语音的实际发展情况相符合的。在词汇研究方面,公元1世纪就产生了《方言》,2世纪末又产生了《释名》,这些著作基本上是以当时的口头词汇作为研究对象的。可见,我们的古人无论是对汉语语音的研究,还是对汉语词汇的研究,都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属于语言学性质的。就是在今天,我们仍然把这种性质的研究划在语言学的范围之内。

古代语言学是否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呢?回答这个问题时,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些原则:当我们衡量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独立的资格时,首先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对象,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方法,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科学体系,其次要看它有无独特的研究成果。用这些原则来衡量一下,我们可以说,从汉代开始,语言学已经算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了。《方言》、《说文》、《释名》这三大名著的产生,就是语言学独立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。我们说扬雄、许慎、刘熙是语言学家,大概多数人是会赞同的吧。汉以后,各个历史时期都有人从事语言学的研究工作,也可以说得上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。像李登、张揖、郭璞、沈约、刘勰、颜之推、陆法言、陆德明、颜师古、徐铉、徐锴、吴棫、韩道昭、周德清、陈第、方以智、顾炎武、江永、戴震、段玉裁、王念孙、王引之、江有诰、陈澧、俞樾、孙诒让等人,都是重要的语言学家。他们在汉语、汉字研究方

面,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,创造了一套完整的研究方法,形成了优良的传统。当然,他们在观点上、方法上,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,在本书的有关章节中将会具体论述。另外,我们也应看到,古代的语言文字学和经学的关系的确非常密切,但古代哲学与经学的关系不是更为密切吗?就是史学、文学与经学的关系在先秦时代也不是那么分明。《诗经》是道道地地的“经”,但它也是不折不扣的文学作品;《书经》是道道地地的“经”,但又是不折不扣的历史著作。如果我们还跟古人一样,只在“经学”这个概念中兜圈子,不唯看不到语言学的独立存在,就连文史哲的独立存在也成问题了。就语言学的三个部门而言,也不可一概而论。训诂学与经学的关系最为密切,文字学次之,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可以用于“经学”,但音韵学的产生和发展跟经学并没有绝对的关系,如《切韵》系韵书和《中原音韵》系韵书的存在,难道不是独立的吗,能说这些著作都是经学的附庸吗?

有的人之所以不承认中国古代有语言学,不承认语言学的独立存在,一方面是受了“洋教条”或“土教条”的束缚;另一方面,也是更主要的方面,是对中国古代语言学没有做深入的研究。所以,我们要加强对语言学史的研究工作,要造就一批既懂得辩证法、唯物主义,又能贯通古今的语言学史工作者,要写出多种不同风格、不同流派的“中国古代语言学史”来。围绕着这个任务,我们有下面一些工作要做:

用先进的理论作指导,对中国古代一些语言学名著重新进行整理;

要把古代语言学著作的系统、流派清理出来,从理论上建立起历史的联系,弄清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些基本规律;

要开展断代语言学史的研究,如“明代语言学史”、“清代语言学史”这样的题目,还从来没有人做过,做好这些题目,有利于对整个中国古代语言学史进行深透的研究;

对古代语言学著作中的一些常见的名词术语要进行一番彻底的研究,基本名词术语搞不清,我们就难以对古人的学术成果做出准确的评价;

要写好古代语言学家的评传。

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要等这些工作全都做好了之后,才能动手去写一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。而是认为:这些工作是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的人应当做的。有一定数量的人来从事这种研究工作,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水平才会有一个很大的提高。

有人问:研究中国语言学史究竟有什么意义呢?在这里,我谈点不成熟的意见:

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,每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都应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,继承并发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。语言学史是整个文化史的一个部分,不仅研究汉语的人应了解汉语研究的历史,就是研究哲学史、文学艺术史的人,也应该对汉语研究的历史有一个起码的了解。汉语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,不仅中国人在研究汉语,国外也有不少人在研究汉语。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对汉语研究史的研究无疑具有国际意义。

传统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学虽然观点、方法都很不一样,但历史的经验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,至少也应该把它放在跟介绍外来经验一样的位置上来对待。拿汉语史的研究来说,在很多方面就要利用古代语言学的成果,如果撇开这些成果,我们对汉语史的研究就会碰到很大的困难。

研究语言学史还要解决一个分期的问题。本师王力先生在《中国语言学史》(山西人民出版社,1981年)中将整个中国语言学史划分为两个大阶段:第一阶段是从汉代到清代末年;第二阶段是从1899年到1949年。台湾省有位语言学家认为第二阶段(西学东渐的时期)的上限应提到明末。我个人认为这个意见不可取。明末到清代,某些西洋传教士和外交家,虽然也写了一些研究汉语的著作,中国个别语言学家也接受了一些西方语言学的影响,但这并非主流,不应作为分期的根据。王力先生以《马氏文通》(1898)作为两大阶段的分水岭是很正确的。因为《马氏文通》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著作,它的出现,意味着古代语言学的终结,标志着现代语言学的开端。不过,我认为:古代语言学史和现代语言学史应该分开来写,各自独立成篇。本书名为《中国古代语言学史》,就整个中国语言学史(古代的,现代的)而言,它只写了第一个大阶段的内容。在这一阶段中,我又分为六个时期,即:

先秦时期(?—公元前3世纪);

两汉时期(公元前2世纪—公元3世纪初);

魏晋南北朝时期(公元3世纪—公元6世纪);

隋唐宋时期(公元6世纪末—公元13世纪);

元明时期(公元13世纪中叶—公元17世纪初);

清代(公元17世纪中叶—公元19世纪)。

拿朝代分期不很理想,而朝代不同,往往学术风气、研究对象、重点也会有所不同。故此,人们在汉语研究中就会造成阶段性的特点,这是我们进行分期的主要依据。

先秦时代以研究事物名称为特色;两汉以研究文字、词汇为特色;魏晋南北朝是汉语语音研究的开始阶段,是词义研究进一步发

展的阶段；隋唐宋是汉语语音研究趋向稳固、统一的阶段，在文字学、语义学方面没有取得什么像样的成就；元明时代的语音研究以面向实际为主要特色；清代以研究古音古义为根本特色，这是古代语言学进行大总结的时期。

阶段的划分只能以反映某一时期的本质特征为原则，不可能照顾到各个方面，如拿等韵学的发展来说，应该是宋元算一个阶段，明清算一个阶段。而从全盘考虑，清代语言学不同于以往各代，特点很突出，应自成一段。我以为不必用绝对的观点来看待分期的问题，期与期之间不可能是一刀两断的，中间有继承，有过渡，有联系，不一致，这都是很自然的事，只要大致上合理，就不必斤斤计较了。而且用朝代分期，固然能反映各个朝代有自己的学术特色，但也不是十全十美的办法。

一本中国古代语言学史究竟应当怎么个写法才好呢？这个问题我也仔细琢磨过。首先，我以为跟哲学史、文学史的写法应有所不同，如在语言学史中就无须用很多的篇幅去讲作者的世界观，去分析作品的思想性，也不必费很多的笔墨去谈社会背景，但语言学又跟文学、哲学、佛学、经学等有密切的联系，把这些联系恰如其分地揭示出来，对研究古代文化史也不无裨益。其次，怎么写跟为谁而写是分不开的，本书是为大学生和具有同等水平的语文工作者而写的，这些同志一般都学过“音韵学”、“汉语史”这样一些课，所以我要力避重复，凡是在这些课程中已经解决得很透的问题，本书就少谈或不谈，如《广韵》是古代语言学史中第一流的名著，本书只用不多的篇幅就交代过去了，就是基于以上的考虑。第三，我以为不论怎么个写法，似乎都应当把各个时期的语言文字学原著放在中心地位来评说，离开了原著，还有什么“史”可言呢？对广大读者

来说,把原著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来分析评论,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,因为这样得到的“史”的知识,是具体的而不是空洞的,是连贯的而不是孤立的,何况有的原著一般读者已经很难看到了,不做必要的介绍就会“不知所云”。第四,作为一本“史”来说,应该综合当前研究的最高水平,应该是一个时代的智慧的结晶,不可能每一条材料都由著者发掘出来,也不可能每一个正确的论点都是著者的独创,著者有责任吸收各家之长。“天下无粹白之狐,而有粹白之裘,取之众白也。”^⑥遗憾的是我有“取众白”的愿望,却缺乏精辨“黑”“白”的能力。且何者为“黑”,何者为“白”,也容许个人持不同的看法,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正确,诚不敢自以为是。我之所以要把这部不成熟的书稿交给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,一是应教学之急需,另外也是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。

本书的写作始于1981年7月,1982年9月我为本科生、研究生、进修教师讲授“中国古代语言学史”。在讲义的基础上,改写成为这本小书。严格说我写这本小书的条件并不是很成熟的,虽然1982年我已进入知天命之年,而此前十余年的运动、劳动,致使学业严重荒疏。书中留下的种种不足甚至谬误,可证此乃急就之章。我说“希望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”乃实话实说,非故作谦虚之态也。

本书的出版,得到河南人民出版社的支持,刘义质、林金保二先生为责任编辑;李学敏同志利用业余时间为我誊清了部分原稿。在此一并表示感谢。

何九盈

于北京西郊蔚秀园

1983年5月

注:

- ① 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- ② 这些蒙童识字课本是:《史籀》十五篇,《八体六技》一篇,《苍颉》一篇,《凡将》一篇,《急就》一篇,《元尚》一篇,《训纂》一篇,《苍颉传》一篇,另有《别字》十三篇,合计三十五篇。其中《别字》一书,钱大昕认为就是扬雄《方言》(见《述言》,第27页)。不可信。
- ③ 六书:指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。六体:指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隶书、缪篆、虫书。见《汉书·艺文志》。
- ④ 《汉书·艺文志》的小学十家也包括几种训诂书,如扬雄《苍颉训纂》、杜林《苍颉训纂》、杜林《苍颉故》。全是《苍颉》一书的训诂,注释经典史籍的训诂书不包括在内。
- ⑤ 段玉裁:《六书音均表》一,见《说文解字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年,第816页。
- ⑥ 陈奇猷:《吕氏春秋校释·用众》,学林出版社,1984年。

1995年广东增订版自序

“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”^①，章学诚这话颇有几分道理。它说明历史著作很难写，也说明社会对史学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。

学术史当然不能与社会史相提并论，但要把学术史写好，并非易事；要把中国语言学史写好，尤非易事。

中国最早的、独具规模的学术史专著是黄宗羲的《明儒学案》。“五四”以后，单科学术史如雨后春笋，应时而生，唯独语言学没有系统的、完整的发展史问世。直到王力先生的《中国语言学史》出版，才算填补了这个空白。王著有导夫先路之功，是这种研究工作的开始，而不是这种研究工作的终结，所以有步后尘之作。我写的《中国古代语言学史》就属于这种性质的著作。

“学然后知不足，教然后知困”^②，写然后知难。青年时代，我听过王先生讲《中国语言学史》，“知不足”矣；壮年时代，我教过几遍《中国语言学史》，“知困”矣；后来，写了《中国古代语言学史》，知个中之难矣。

“知不足，然后能自反也；知困，然后能自强也”^③；知难而进也。自反而思，一部语言学史，要范围千古，牢笼百家，戛戛乎其难哉！

第一难通古人之书。以钱大昕之博学多才，犹感叹：“史之难读久矣！”^④而况古代的语言文字学著作，多系专门绝学。啃一部著作比啃一个苦涩的干果还苦涩。义例纷纠，概念混乱。转注假